关注国乒

伊藤屡放豪言 陈梦埋头苦练

日本名将伊藤美诚近日屡发豪言壮语:“希望在明年的奥运会赢得冠军”,“我相信将来会击败陈梦成为世界第一”。

四年前在里约奥运会,年仅15岁的伊藤美诚就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团铜牌,成为乒乓球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奖牌得主。近一年来,她的实力快速上升,世界排名达到历史最高的世界第二位,也是国际乒联自1991年实行现行排名制度以来,日本选手达到的最高排名。

伊藤美诚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渴望击败中国队队员、在各项赛事中夺冠的“野心”,可惜最终基本没能实现。过去一年,她不时能闯进决赛,但笑到最后的都是中国队员。尽管屡次受挫,但伊藤美诚在赛后总会发表“总结性”言论,希望下次交锋能卷土重来。然而,伊藤美诚的言论有些过头了——如果一直这么盲目自信,恐怕不用国乒出马,自己就会栽大跟头。

国乒正在澳门封闭训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表示,集训一切顺利,一旦疫情好转,随时可以战斗。而日本队的集训基地因疫情关闭,伊藤美诚只能宅家训练,据说也没怎么练,主要通过追剧打发时间和缓解压力。比起正在埋头苦练的陈梦,伊藤美诚靠什么来击败强敌?

伊藤美诚的另一“狂言”——疫情不会影响和水谷隼搭档的混双。双打项目除了需要合理配对,还需要不断地磨合、提升默契度,但伊藤美诚“自信”地表示:“我们可以分开练习。就算在比赛期间,我们也只会在赛前练20到30分钟。所以对混双我真的不用很担心。”

事实上,伊藤美诚和水谷隼从未赢过中国的许昕/刘诗雯。不练习还觉得能打败未赢过的选手,伊藤美诚的心态可真够“乐观”。相比之下,中国队正加大混双的训练力度,不仅每天抽出时间练习,还经常进行队内比赛,以提升应变能力。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才有国乒的长盛不衰。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体坛热点

英超重启获“放行”

英国政府“解封”计划第二步包括在6月1日以后允许联赛空场举办

当地记者在英超总部前录像 图/视觉中国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报道: 英国政府昨晚发布长达50页的文件,详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整措施,安排当地的复工复产,其中对体育活动也有详尽规定:赛事可在6月1日之后陆续恢复,但比赛必须空场进行。

根据英国政府的计划,接下来的“解封”第一步只是有限地复工以及鼓励学校接纳更多有需要的学生入校。允许文体活动空场举办并进行转播,以及允许非必需品零售店开门都属于第二步内容。不过,这无疑为英超重启开了“放行”的绿灯,也意味着继德甲宣布5月16日重启之后已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英超有望成为第三张骨牌。

在英国政府宣布为英超重启放行之后的数小时,丹麦超级联赛宣布将于5月28日空场重启,是德甲宣布重启之后波及的第二张骨牌。三天前,法罗群岛联赛已经开战,但并非重启,只是原定3月份开幕的联赛在延期两个月之后终于打响,是德甲重启后波及的第一张骨牌。不过,这个丹麦海外领地位于苏格兰以北600公里的大西洋,是欧洲的“天涯海角”,常住人口仅5万人,因而这个小联赛的重启基本被忽略。

其实,英超一直在做重启的各项准备工作,甚至已有具体方案并已上报有关方面,如今英国政府“开绿灯”很可能加快重启的步伐。不过,鉴于英国的疫情仍在蔓延,严重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因而英超重启仍面临许多困难。

困难之一是英超需要对球员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4万次的核酸检测,由于英国的检测能力面临严重瓶颈,此前曾不得不暗中空运5万份样本到美国检测,如英超再加4万个样本,恐怕很难应付。困难之二是英超各俱乐部立场不同,对比赛重启的具体方式存在意见分歧。英超高层希望重启后比赛在中立场地开踢,以减少球迷聚集;但排名靠后的六家俱乐部坚决反对,其中布莱顿、维拉和沃特福德公开表示此举不公平。一旦英超需要投票表决,在20家俱乐部中至少有14家同意才能通过,若再有一家俱乐部反对就可能无法通过。

亮话体坛

新赛制带出新难题

中超联赛因疫情而延期,要在半年内完成常规的30轮比赛难度很大,因此需要调整原来的赛制。昨天传出消息,新赛季很可能采用“蛇形分组”的“常规赛”加上淘汰赛形式的季后赛来进行。

与此前外界普遍预测的分组形式有所不同,“蛇形分组”取代“南北分区”成为最热门的候选。

“蛇形分组”是体育界常用的分组比赛形式,即将16支参赛队根据去年联赛的名次,将第1、3、5、7(以下顺推)名的球队编到一组,将第2、4、6、8名的球队编到另一组,如此产生两个小组。

足协之所以重点考虑“蛇形分组”,因为确实比“南北分区(组)”更为公平。

如果采用“南北分区”,会出现两大问题。

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北区队”有9队,而南区队为7队,需要调剂一支北区队到南区组。选哪队去?怎么选?被选中的愿意吗?

另一方面,如果天海俱乐部因无法达到准入标准而最终退出,由深圳佳兆业递补参赛,那么南北两区的队伍数量倒是平衡了,但是实力分布仍然失衡——上赛季的中超前四名有三支在南区。

相比之下,“蛇形排位”可更大程度地保证分组的均衡性。

南北分区的优势在于交通相对便利,但是对于球队来说,去客场无论远近基本都要坐飞机,时间成本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相比起没有太大争议的“蛇形分组”,季后赛的赛制则需要足协多费思量。

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每个小组前四名将进入争冠组,后四名进入保级组,各自进行总计为六场的主客场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名次。

那么,是在“决赛”阶段才令不同组的球队可以相遇,还是在季后赛一开始就打通?也许后者能更好地增加对阵的丰富程度和观赏性。

至于如何保证第五到第八名、第九到第12名等相对“无欲无求”的球队的比赛积极性,也许可以将最终名次与联赛分红的金额部分挂钩,以此来激发“中游球队”的战意。

既要配合防疫要求压缩赛程,又要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和观赏性,还要给亚冠联赛、国家队征战世预赛留出空间,今年中超新赛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细化。

·赵亮晨·

意甲·今晨

5月18日:各俱乐部恢复团队训练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毅报道: 意甲重启医学安全指引原定上周末通过,但目前仍在修订;不过意大利政府今晨宣布:各意甲俱乐部可从5月18日开始恢复团队训练。

意甲俱乐部从5月4日起逐步恢复球员个人训练。意大利足协牵头制定的医学安全指引迟迟未获通过,这份指引是5月18日恢复团队训练的重要保障。

对于这份指引,争议焦点在如出现新冠病毒阳性病例,是否需要全队隔离。意甲俱乐部老板打算效仿德甲的处理方式,即只隔离确诊人员;意大利政府的科技委员会坚持认为全队需要隔离两周。近期,桑普多利亚、佛罗伦萨、都灵等意甲球队查出多个新冠病毒阳性病例,给恢复团队训练造成困难。

意大利足协与科技委员会多次磋商,终于取得进展,认定这份医学安全指引只需再微调。意大利体育部长斯帕达弗拉、卫生部长斯佩兰扎今晨发表联合声明称,科技委员会基本接受这份指引。不过,斯帕达弗拉在接受采访时警告,5月18日开始团队训练后,某支球队的球员如果再出现新的阳性病例,全队仍将隔离14天。

至于本赛季何时重启,斯帕达弗拉还是没能给出明确时间点:“所有有关人员继续谨慎为之,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至少还需要一周时间才能了解传染曲线,然后做出下一步决定。所有团队训练将于5月18日重新开始,明天我将提交文件,确保所有体育场馆在5月底之前以安全的方式重新开放,从健身房开始。”

中国足协将召开三级联赛会议——

深足能否重返中超?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本剑报道: 中国足协昨天向各俱乐部下发通知:从明天起在上海连续三天先后召开中超、中甲和中乙三级联赛俱乐部总经理会议,商讨新赛季各项事宜。由于中超准入结果尚未正式公布,深圳佳兆业俱乐部仍参加中甲的会议。

此次会议将通报三级联赛开赛计划,听取各俱乐部对本赛季各项工作安排的意见与建议,为新赛季开始做好准备。5月7日至11日,足协相关部门在香河就新赛季各级职业联赛开赛、赛制设计与调整、准入资格、各级联赛升降级衔接等问题集中讨论并做了多种方案。这些方案需要进一步与俱乐部沟通,然后做出修改。

有报道称,天海俱乐部昨天已致函中国足协,决定放弃中超资格,并已开始善后工作,天海教练组组长李玮锋昨天也公开发文正式告别。按规定,天海退出后,去年中超排名倒数第二、降至中甲的深圳佳兆业将以第一顺位递补。由于足协尚未正式公布三级联赛的参赛球队名单,因此佳兆业俱乐部尚未正式回应重返中超一事。

我的母亲

□王则楚

1952年的全家福。
左起:王则柯、王兆凯、王美娜、王起、王丽娜、徐碧霞、王则楚

我的母亲徐碧霞,是父亲王起最困难、最有成就、最幸福时期的伴侣,而我是她与父亲最小的儿子。我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知道的许多关于母亲的事情,大多数来自哥哥、姐姐们的叙述。但我自己的母亲还是在自己的心里。

父亲与母亲两人相爱,冲破传统约束私奔,并且以父亲注释《西厢记》并总结出“张生跳墙、王生跳船”而广泛流传。夏承焘先生书写、父亲撰写的对联“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 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一直挂在家里餐厅的墙上。

我的母亲给了我生命。为了我的诞生,她离开父亲回到在温州乡下的家里待产。那是在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温州。母亲生下我之后,由于我排尿不顺,憋涨得满脸通红,肚子鼓胀,哭喊不已。

母亲抱着我去温州看医生,要经过日军守着的南门。为了避免日军的纠缠,母亲特别用炭灰把脸弄得脏乱,穿着也十分破旧。顺利通过之后,直奔医院。医生用针管和导尿管小心翼翼地对我这个才出生不久的婴儿进行导尿。医生用针管通我的尿道,拔出针管时,憋出的尿射了医生满头满脸,这才得以挽回我弱小的生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我一直十分溺爱。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父亲到之江大学任教,才回温州把母亲和我带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住在了钱塘江边著名的六和塔下。自此,母亲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

我随母亲到杭州之后,全家基本上就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连则柯哥哥也上小学了,只有我还小,留在母亲的身边。每次家里的亲属来杭州,母亲都带着我参加与亲属的活动。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母亲表示,我是她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父亲想起有个姓吴的学生认父亲做爹,结合长江出海属吴国,湘鄂在上游,有“吴头楚尾”之意,给我取名王则楚。广东话俗语说,“拉子拉心肝,拉女拉五脏”,我这个“拉子”,的确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学本部。由于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曾是浙江大学教授会秘书的父亲,起草了《浙大教授会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事后,浙江大学在当局的压力下,没有继续发聘书给父亲,父亲只好暂时到之江大学任教。而这时刘节先生介绍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我们全家经上海,坐四叔的轮船到广州。刚到广州,我们家住在中大文明路校区的西堂。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我的爱首先表现在对我贪吃要求的满足上。

我非常调皮,爱乱吃东西。在中大文明路校区,我和我儿时的朋友詹安泰先生的儿子詹叔夏、戴辛皆先生的儿子戴念坪一起,还曾把石栗树掉在地下的果子的核砸开来,吃里面的仁。在石牌校区,我曾和王越先生的小儿子王思华一起在法商学院下的蚕桑田里摘桑子吃,结果吃到西门那里迷了路,是当地的解放军把我们送回来的。也许是乱吃东西,又不干净,我还因为闹蛔虫,肚子痛得直叫。妈妈把我和患黄疸型肝炎的则柯哥哥送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留医。从此,妈妈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吃饱,少去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记忆中的好吃的零食,几乎都是母亲自己做的。到了康乐园校区,我们住在模范村的西南区11号,母亲用糯米粉和着红糖做我爱吃的红糖糯米团子,做好后放在像泡菜坛子那样的坛子里,放在家里南边的小走廊里。我和岑祺祥先生的儿子岑运华还偷吃过。

家里西边的天台上,房子边上像大杨桃一样的“酸捻”,母亲摘下来,切成一条一条的果片,用红糖熬熟了,取出来放在竹箩上晒干,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每当我闹着要吃东西的时候,母亲总能变出好吃的果子,平息我的哭闹。

到了住进东南区1号,在陈寅恪先生的楼下,妈妈还买了留声机,唱片里除了有父亲喜欢听的京剧唱片外,还有王洛宾收集和创作的新疆歌曲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我启蒙的音乐感觉,就来自母亲的这些唱片里的旋律。我那个时候最想要《水浒传》的连环画,记得一套需要6元钱,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但母亲在儿童节的那一天还是到永汉路(今天的北京路)给我买了。

哥哥姐姐喜欢打羽毛球,母亲还给我们买了球拍和网,把网挂在房子东边的两棵桉树之间,让我们玩耍。

母亲教育小孩坚持的是:身教重于言教。记得我小时候写毛笔字,要描红,母亲总是把笔、墨准备好,教我把水滴在墨盒里,用毛笔掭墨盒里的棉纱,把一个小鸡蛋放在我手心,让我的手里包着鸡蛋握笔,一笔一笔地写。晚上我做作业,母亲会陪着我读她正在学习的俄语。甚至为父亲抄写文稿时,她也会带着我一起抄。她那种认真的态度,让我觉得读书写字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当然,我是非常贪玩的小孩,但母亲从未阻止过我出去玩耍,而且总是在进门的半圆桌上摆着一大瓶凉开水,让我回家时喝个痛快。

吃饭了,我还没有回家,母亲会在门口大声地用温州话喊:则楚,回家吃饭了。对门的姜伯母(姜立夫太太)都记得非常清楚,多年后还和读大学的我说起这件事。

在母亲宽容的教育下,我们五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大哥王兆凯考上北京钢铁学院,二姐王美娜考上清华大学,三姐王丽娜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三哥王则柯和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按父亲说的,母亲很会持家,母亲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持家本领让我记忆深刻。在中大石牌校区我们家住在松花江路10号,那是整个斯大林广场周边住宅的东南角斜坡下的一栋房子,前面是农民的一片烟叶田,直达茶山湖边,后面是一片松树林,门前的阶梯下的左边有一片小空地,晴天的时候,母亲会在那里撑起竹竿晾晒衣服。秋冬季节,几乎过一两天母亲就会用竹箆子到松林里扒松针回来烧火,我跟着母亲把箆子上的松针拉下来放到竹箩里。在松林边上,我们家开挖了一小块地,种了番薯。

母亲的手很巧,孩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大人的旧衣服翻个面就变成了孩子们的新衣服,而且都是那时最时髦的样子。

不仅是由于母亲相夫教子的支持,才有父亲的成就,就是父亲的研究工作,母亲也是与父亲有共鸣的。我就跟着母亲一起陪父亲观看过越剧《红楼梦》,观看过丁是娥的沪剧《罗汉钱》,以及我感到非常好看的京剧《三岔口》。丁是娥到家里与父亲谈论戏里的表演,母亲也会在一旁聆听。

母亲与父亲一起读西厢,一起散步,一起看戏,一起谈论演出的好坏,替父亲誊写稿件时对个别词句也有纠正。无论解放前在松江、龙泉,还是解放后在广州,无论在《西厢五剧注》发表前后,还是父亲确立关汉卿在元剧史中地位的前后,应该说,在父亲的成就里,绝对有一半的功劳是属于母亲的。

母亲的持家本领,最能够显示出来的是她担任中大家属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家属委员会担负了组织家属工作的任务,母亲组织“缝纫社”为教工、学生缝缝补补、做衣服、改衣服,搞得红红火火。这个缝纫社既有刘节夫人这样的大教授夫人,也有工人的家属,甚至是滞留在中大的遗属,母亲都一视同仁热情对待。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在中大家属里有许多的朋友。

1957年母亲的病就查出来了。1958年秋天,母亲病重住进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难以进食的母亲骨瘦如柴,眼睛很大,颧骨突出,吃东西很难下咽。我曾经自己一个人从广雅步行到母亲住的医院去看望过母亲。她总是担心我年纪小,失去母亲之后会没有人管,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要坚强起来,不要流眼泪。据丽娜姐说,母亲要求父亲一定要好好对我,不许打我。

母亲病重的时候,大哥大嫂和美娜姐都从北京回来看望。由于大哥是右派,只批准他很有限的探望时间,他和大嫂没有等到母亲去世就回北京了。大哥离开之前,全家在广州照了张合照。美娜姐则是留在广州,陪着母亲直到去世。母亲是看到照片后才闭眼撒手而去的。

母亲被安葬在中大康乐园校区西北角的墓地。出殡的那天,棺椁从南门进来,抬过生物楼前的小道,转到墓地去。很多人在路的两旁给母亲送行,送葬的队伍从九家村一直排到生物楼。父亲很惊讶地说:怎么这么多人,许多我并不认识。母亲在家属委员会的姐妹们更是一直送她到墓地。

站在坑边,看着泥土把母亲的棺椁覆盖,我和痛哭的姐姐不同,一言不发地默默在心里向母亲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做个像妈妈一样的和平民老百姓能够打成一片的好人。

现在,每逢清明我都会带着家人去母亲墓前祭拜。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我在家里写下很久就想写的《我的母亲》,但愿云祭拜把我的思念带给我在天上的母亲。

“瞧”与“瞧不起”

□刘荒田[美国]

许多年前,我在旧金山接到一个电话,女性来电人报上名字。我记起来,数位纽约和洛杉矶的诗友不久前在谈诗的间隙,提到这位刚出国门的诗人,说她一副“天下诗家唯我独尊”的派头,动不动训人,要我小心。我当时漫应之曰:“关我什么事?又不抢她的风头。”不料大人物找上门。我客气地问好。她问我知道她的名字否?她期待的回应该是:“哦哦,敬慕久矣!来到这里了?我如果早点知道,就和众诗友去接机,设宴接风,请您做一场演说……”可是诗友的告诫没忘,我淡淡地回答:“不知道哎。”她有点不耐烦:“怎么?我的名字是:×-×-×。”“大名真的没听过,我太闭塞了!”她恨恨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接着,大谈她的成就,声名,幸亏我未失握话筒恭听的耐力,但未加评论。最后,她忍不住,严肃地批评我:“我的中英双语诗作,你一首都没看过,凭什么瞧不起人?”我正要申辩:正因为没“瞧”,所以不存在“瞧不起”;当然,也没有“瞧得起”。但她已搁下电话,估计专心生气去了。

从此,一看到某些人面子上的惨淡经营,就想起这一逸事。继而想,兹事体大的“面子”,其实是要分割为两个步骤的:第一,有人瞧;第二,瞧得起。

如果是受公众关注的行为,我们最在乎的自然是“面子上好看”。办婚礼,迎亲队伍非要多少辆法拉利,至不济也是奔驰,新娘身上的首饰若不够数,须租镀金的。更不必说铺天盖地的各种工程。即使在“面子”失去实用性的环境,如“锦衣夜行”一类,我们还是放心不下,因为贴邻盯着,揣着小算盘的亲友每时每刻地和你比,你的孩子上的是不是名校,最近考了第几名,你家的空调,牌子是不是比他家高级。

“面子就是一切”的人到海外后很快发现,首先的难题是“没人瞧”。崇尚个人的社会,个体生命是独立自足的,其价值不体现在别人羡妒的眼光与掌声中。各自选择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只要不干犯法律和风俗,都受到尊重。这尊重并非是“恩准”,而是不予干扰。比如说,谁家养狗都不是为了参展,各自遛个不亦乐乎,但主人须当铲屎官,不能让别人替你善后。

从这点出发,我忽然醒悟,移民们为什么热衷于衣锦还乡,部分原因在于:在侨居地长久地“没人瞧”,给憋坏了。一位在旧金山赌场赢了20多万美元的厨师,回老家用100元面额的美钞替父老们点烟。

务必整出动静,为了“有人瞧”;非要如鲁迅说的,马脚蒙上麒麟皮,或“拉大旗作虎皮”,为了让人“瞧得起”。出门之先,为了注目礼和回头率,不化妆一两个小时行吗?微信的朋友圈,三天两头发的“豪华游”系列照片,原来是在家里按操作规程拉背景板拍的。

若问,摒去和“瞧”有关的两个魔障,人生是怎样的呢?有一则小品,说的是:西京一僧院后面,有一个茂盛的竹园,官儿们趋之若鹜,历仕四朝的宰相文潞公(彦博)也常常前去游览。僧人慕他大名,请求他命名。他爽快地答应了。但过了几个月没下文,僧人很不耐烦。文潞公说,“吾为尔思佳名未得,请少待。”足足过了半年,宰相才把名字送来,僧人大喜过望,打开一看,却是“竹轩”二字。上文那位女诗人自以为风靡全球的诗,我们流水账一般的日子,不也这般吗?竹轩就是竹轩,瞧与否,瞧得起与否,它都在那里。